



《江苏文库》精华编主编，南京大学教授
徐兴无

徐兴无
书 | 话 | 文 | 脉

2022年7月，江苏文脉大讲堂启动，邀请专家、学者深入13个设区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高校、企业等，以市民讲座的形式传播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成果，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广泛欢迎。2023年，江苏文脉大讲堂系列讲座将继续开展。与此同时，在报纸与江苏文脉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开设专栏，邀请专家、学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江苏有史以来的典籍著作及其背后的人与事，在传统与读者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专栏首个系列，邀请《江苏文库》精华编主编、南京大学教授徐兴无开设《书话文脉》。

导读

阮元是清代的大学者、封疆吏、帝王师。他和镇江人的三本书的故事，堪称江苏文脉的传奇。这里有沧桑的等待，有缘分的邂逅，也有世事的遭遇。正是依靠像他这般持守的人，千年文脉才得以如缕不绝。



江苏文脉



扫码关注
江苏文脉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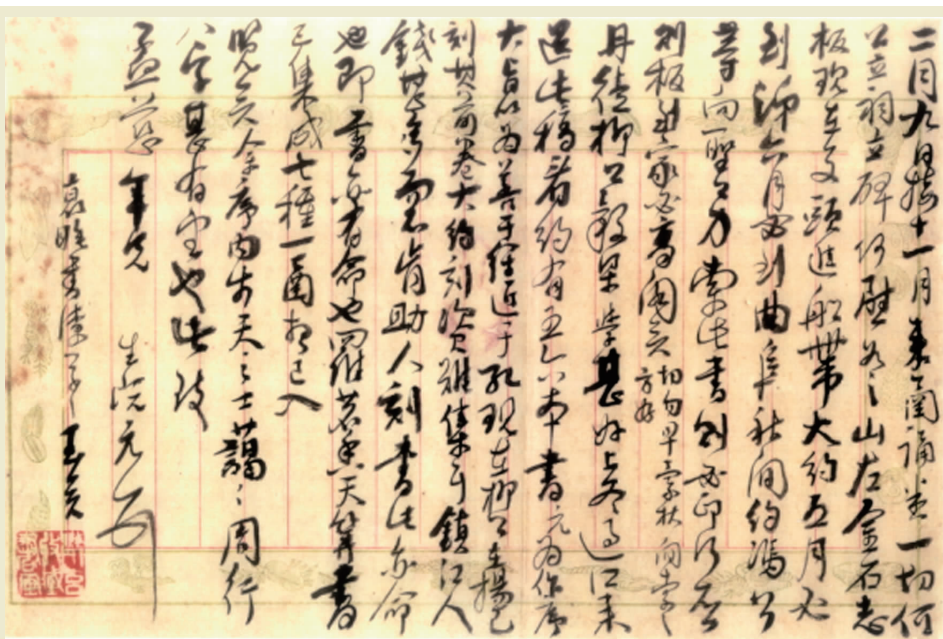
阮元与镇江人的书

徐兴无

清人梁章钜(1775-1849)《楹联续话》卷三《佳话》记阮元(1764-1849)书写楹联鼓励镇江盐商包氏出资刊刻宋元《镇江志》之事：

镇江有某饷商，欲求阮芸台师书楹帖，师未许也，而某商愈欲得之。师令人语之曰：“我有两部旧书，应归镇江人刊行。如肯成此美事，必书楹帖以报之。”某商首肯。师即以七字联句奖之云：“古籍待刊三十载；旧闻新见一千年。”跋云：“嘉庆间，余得宋嘉定、元至顺《镇江府志》两部，皆《四库》未收之书。曾经进呈，得蒙恩鉴，因以底本贮之焦山书藏。三十余年，无过而问者。岁辛丑，丹徒包怡庄学兄请付枣梨。镇江之书，归镇江人珍护，甚善。不意归田老眼，尚见此书之成，乃知书之行世，及刊书之人，迟早皆有福命焉。因喜而记之。节性斋老人阮元撰并书，时年七十有八。”此书近已刻成一部，其一亦已开雕矣。

梁氏所记趣闻轶事，不见清人张鉴等所编阮元年谱《雷塘庵主弟子记》。南宋嘉定和元至顺年间修撰的《镇江志》是中国古代方志珍本秘籍，阮元《校刻宋元镇江志序》(《擘经室再集》二集卷二)称两书为乾隆六十年宣城张昉所赠，嘉庆间进呈内府时校录两份副本，一份藏于阮元家中的文选楼，另一份藏于嘉庆十八年(1814)他在镇江创建的“焦山书藏”藏书楼(见《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四)，“以待有志者刊之。”阮元曾分别为两《志》作《提要》，收入其《四库未收书提要》，道光二年(1822)编入阮元《擘经室外集》卷一。丹徒盐商包氏刊刻之时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2)，次年完工，距阮元校录两《志》已达三十载。南宋嘉定至清道光朝虽六百多年，然阮元《嘉定镇江志提要》曰：“镇江自六朝以后，递为重地，南渡以前之遗文坠典，如唐孙处元《图经》《祥符图经》《润州集类》《京口集》之类，世无传本，籍此以存厓略，零圭碎璧，尤可宝惜。”故以其中保存唐代地志文献而言，足当千年。刊刻之时，阮元又命门人刘文淇、刘毓崧父子“重加校正”，“详考全书体例及所征引各



陈中凡教授藏《阮芸台致汪喜孙函》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丹徒包氏刊宋元《镇江志》书影

书，正其讹误，作为《校勘记》四卷附刻于后”，并代其撰写《校刻宋元镇江志序》，今此《序》并刘氏《宋元镇江志校勘记序》皆收于刘氏《青溪旧屋集》卷五。刘氏《校勘记序》记载阮元特命刘氏校勘不必因为自己《擘经室集》所收二《志》的《提要》文字在前，就“有所牵就，总期实事求是，不为凿空之谈。”其鼓励后学严谨治学，纠正前人谬误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此则楹联佳话传播甚广，但其中深意尚可推考。阮元强调“镇江之书，归镇江人珍护”，并刻意向镇江盐商募资刻书，一则表达了他倡导地方有责任保护传播地方文献的主张，一则对当时镇江富人不热心刻书事业心存不满。此可旁证于他与镇江学人柳兴恩的轶事。南京大学中文系陈中凡教授(1888-1982)藏《阮芸台致汪喜孙函》一纸(《南京大学藏名人手迹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中有云：

丹徒柳公《谷梁》学甚好，上冬过江来送此稿，看约有五、六本书。元为作《序》，大旨以为善于经，近于孔。现在柳公在扬已刻其前卷，大约刻资难集耳。镇江人钱甚多，而不肯助人刻书，此亦命也，即书亦有命也。

丹徒柳公即柳兴恩(1795-1880)，字宾叔，号润江，道光十二年举人，生平见《清史稿·儒林传》等，著有《春秋谷梁大义述》，极为阮元称道，亲为作《镇江柳孝廉春秋谷梁传序》，并延柳氏馆于家中。阮元在《序》中感慨自己编纂《皇清经解》一千五百卷，唯独未能收集清代有关《春秋谷梁传》的研究著作，“道光十六年，始闻有镇江柳氏学《谷梁》之事。二十年夏，柳氏兴恩挟其书渡

江来，始得读之，余甚惜见之之晚也。亟望礼堂写定，授之梓人，与海内学者共之，是余老年之一快也。兴恩为余门生之门生，贫而好学，镇江实学敦行之士也。”(《擘经室再集》一集卷一，按《皇清经解续编》本删去“兴恩”以下文字)。柳氏所编《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八“道光二十年庚子”亦载阮元对自己的知遇之事：“八月，公自订《擘经室再集》序，以《谷梁传序》冠其首……丁未岁(道光二十七年)，公延兴恩馆于家，为诸孙及外孙授经。”阮元得睹柳氏著作，阮《序》云在“二十年夏”，《致汪喜孙函》则云在“上冬”，此当是记忆有误差，但皆当在道光二十年，是年阮元七十七岁。恰恰在道光二十一年，柳氏的著作在扬州已刊刻前卷，但刻资筹集困难，难以以为继。所以阮元既感叹“镇江人钱甚多，而不肯助人刻书”，又欣慰地看到镇江人终肯捐资刊刻“镇江之书”，可谓悲喜交集。

柳兴恩于元至顺《镇江志》的整理亦有贡献。阮元在《校刻宋元镇江府志序》中特别表彰了柳氏的考据之功：“至顺《志》则不知出于谁手，适丹徒柳宾叔孝廉兴恩以书来告，谓检《镇江府志成化旧序》，知至顺《志》为俞希鲁所作。余按俞氏乃元末遗老，为金华宋濂所推，若非详撰此《志》，乌知俞氏之学精密若是？则刻书洵有功于古人也。”

现代国学大师、南京大学史学奠基人柳诒徵先生(1880-1956)《我的自述》云：“我有一族祖宾叔公(柳兴恩)，是我父亲的业师。他的年龄八十六岁，我生的第二年他才去世。”(柳曾符、柳佳编《柳堂学记》)据武黎嵩《柳兴恩与谷梁大义述》(《古籍研



江苏文库·方志编·府县志 第101册《嘉定镇江志》

[宋]卢宪纂
凤凰出版社
2021年01月



江苏文库·方志编·府县志 第101册至第102册《至顺镇江志》目录页

[元]脱因修 [元]俞希鲁纂
凤凰出版社
2021年01月

究》2012年第1期)一文考证，现存柳氏《谷梁大义述》只不过是其所撰百卷本《谷梁春秋通义》的长编大纲，在其生前的道光年间仅刻成一卷，现藏国家图书馆(按，此当即是阮元所云“在扬已刻其前卷”者)，光绪间又有重刻，而百卷本《谷梁春秋通义》则毁于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镇江之兵火。直至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镇江学者陈庆年(1862-1929)整理柳氏《谷梁大义述》遗稿为三十卷，次年刻入江阴南菁书院本《皇清经解续编》之中，此时柳氏已去世七年。世运遭遇如此，岂非“书亦有命”耶？